

力保留本民族、本国传统的愿望，会产生“本土化”的要求来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所以，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二者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并存、彼此镶嵌。

中国处在激烈的社会竞争态势下，在体制建设和科技经济方面必须走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但是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仍会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且人们也会越来越意识到保存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民族文化事业也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现代化和本土文化并存，每个国家的主流群体的文化和少数群体的文化并存，这应当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大方向。

## 【书 评】

# 文化分层下的民族意识构建

——再读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袁剑<sup>1</sup>

在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上，可以说，除了家庭与家族之外，族类成为人们可以为之前赴后继的一种“神圣性”分类。在茫茫的人类战争历史中，人们不曾为神圣罗马帝国或神圣同盟慷慨赴死而自豪过，但为了自己所在的法兰西、德意志或者美利坚去死而无怨无悔。这种心中的家园来自何处，它来自那个远处的呼唤——正如盖尔纳所说的，我们是一群人，我们要让我们的文化有自己的政治屋顶。

盖尔纳（Ernest Gellner）是现代民族主义研究者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这一著作与同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被视为当代民族主义研究的双峰巨著。盖尔纳在书中的民族观是颇为功能主义化的，并以政治建构作为其思想的主线，与安德森的“民族想象论”形成鲜明的对比。盖尔纳认为，当代民族主义的理念构成方式是“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nationalism is primarily a political principle that hold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sup>2</sup> 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原则。这实际上已经成为最近一轮民族裂变的政治“口号”，尽管这种具体的实践已经背离了其原初的语境。这也盖尔纳在书中所说的“民族主义者一般都会抨击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疆域的实质，但是他们绝少为既不存在权力、又没有疆界的现象而哀叹”。<sup>3</sup>

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sup>4</sup>依盖尔纳的看法，民族主义和民族构成是与国家、社会直接联系的。“国家是社会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韦伯语）在各种为了

<sup>1</sup> 袁剑，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学院历史系博士

<sup>2</sup>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下面引用本书径称本书。

<sup>3</sup> 本书，第 6 页。

<sup>4</sup> 本书，第 2 页。



维持秩序而进行的制裁中，最终的制裁（即使用武力）者，只能是社会内部一个特殊的、明确的、高度集中的、纪律严明的机构，而这样的机构目前可以找到的只能是“国家”。一般来说，产生民族主义的条件，并不总是国家本身缺少的那些条件，或者是使国家的现实受到严重怀疑的那些条件，民族主义似乎只会国家的存在早已为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出现。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必然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的出现具有国家选择性。在现代社会，民族性已经深深地嵌入其中。但是，盖尔纳又指出，民族和国家一样，实际上都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此外，民族与国家也不是相同的偶然产物，它们各自的出现是独立的。但是，民族主义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失去对方，就会失去自己，这就是所谓的“one nation, one state”<sup>1</sup>。让那些有着文化共同特征的人群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屋顶下，就构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韦伯对于国家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种内在预设：所谓“国家”都是以西欧国家为模板的，在这种“国家”语境中，核心地域与边缘地域是高度融合的，权力高度集中，并且还具有高度明确的和重要的社会劳动分工。而对这种状态的界定实际上就反过来对没有高度明确和重要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作出了界定：它们不是“国家”。这种判断与黑格尔的国家进化论颇为一致。而依据这样的思路，在工业社会之前的时代，是没有国家的，也就不会存在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时代，其中的民族现象又是如何生发的呢？

盖尔纳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权宜的、临时的定义：首先，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其次，当且只当两个人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换言之，民族创造了人；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如果某一类别的人（比如某个特定领土上的居民，操某种特定语言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使他们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而不是使这个类别的成员有别于非成员的其他共同特征<sup>2</sup>。但是这两个定义仍然颇有问题的，事实上，在用这样的定义为基础去再思考民族主义的问题时，往往会产生对这些先前预设定义的解构，从而形成一种无所稳定的理论状态，在某种循环论证的圈子中将自己转晕。

在盖尔纳看来，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从上到下分布是：（1）军队、行政管理与神职人员；（2）商人统治阶层；（3）分层的水平层级；（4）农业生产者横向绝缘的社群。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农业政体中间，意识形态突出了而不是掩饰了阶级的不平等和统治阶级脱离其他阶级的程度。这个社会所提倡的乃是一种水平的文化分化，在这种环境下，“这个社会中的几乎一切，都妨碍了从文化边界的角度对政治单位所下的定义。”<sup>3</sup>在这种状态下，遗传差异和文化差异被归因为仅根据功能而划分为阶层的東西，其目的是强化这种区别，赋予其权威和永久性。这种社会形态的层级间流动性极为微弱，故而，按照盖尔纳的观点，民族主义也就不能在这种社会中得以生发。<sup>4</sup>只有到了高级文化社会（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由于高级文化遍及整个社会，界定着整个社会，同时也需要得到政体的支持，民族主义在此环境下方开始出现。

当我们再次反思这样的问题时，我们不禁会追问，为何在农业社会就不能产生这种民族主义？如果说是因为农业社会内部所进行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固化了的水平划分无法形成一种纵向性的对

<sup>1</sup> 本书，第 8-9 页。

<sup>2</sup> 本书，第 9 页。

<sup>3</sup> 本书，第 15 页。

<sup>4</sup> 与马克思主义让人们预料的相反，喜欢在社会内部进行水平划分的恰恰是前工业社会，而工业社会则加强了民族而不是阶级之间的界线。



自身身份的共同体认的话，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在水平划分的上层进行纵向化的身份划分呢？按照盖尔纳的说法，在农业社会的国家结构中，其统治阶层通常是僧侣、官僚或军人阶层，尽管这些人这个较为固化的社会中可以其有生之年占据优势地位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势力，但是，这些人并不具有继承性，他们往往由来自下层社会的新成员加以更新，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型塑一种固化的高层群体意识，他们很少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目标？这些在型塑民族的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工业社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所谓工业社会，实际上就是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推崇的“理性化”社会的最初模型，而在这种社会中间，有着两个核心化的概念贯串其间，一为连贯性和一致性，即用相同的方法处理相同的情况，也就是规律性；另一个是效率，即冷静理智地选择可得到的最佳手段，来实现给定的、明确阐述的、孤立的目标，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基于这样两个概念，传统的社会秩序中间的“自治的体系”（有着很多的表现形式，如宗教意识、家族团体、劳动分工不明、自足生产、内部流动等）得以破解。在此情况下，劳动分工得以细化，这就一步步地积累着民族主义的“生命力”。

在工业社会下，社会培训的“主要内容是一般性的训练，所涉及的人从事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活动没有特殊关系，并且是先于后者的。工业社会按照大多数标准，可能是迄今为止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但是，其教育体制无疑是有史以来专业化程度最不强、标准化程度最高的。……工业社会的专业化，正是以共同的非专业化的、标准的培训为基础的。”<sup>1</sup>

而到了现代社会，则更进一步建立了独立的庞大的社会教育体制，从而使得所有原本在前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中能够自我“分形”的次生社群不再具有这种自我生产性。再生产完全社会化的人这件事本身，成了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不再由次生社群自己担任。于是，“一个建立在高能量的技术和对持续增长的期望基础之上的社会出现了，它要求劳动分工有流动性，陌生人之间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共享一种标准的习惯用语和必要时用书面形式传递的精确意思。由于一些集中的原因，这个社会必须完全由外部提供教育：每个人都由专家来培训，而不仅仅由他自己所在的地方社群（如他的确属于某个地方社群的话）来培训。

这个社会规模庞大，具有流动性，较之传统的农业社会极缺乏内部结构，它的组成部分根本不具备再生产自己的人员的能力或者资源。这个社会的成员要想具备工作的资格并享受真正的、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就必须按照一种标准的媒介和共通的概念的要求，达到相当高的识字和技术能力的水准，这是家族或者地方单位根本不可能提供的。只有某种类似现代‘国家’教育体制的东西，某种金字塔似的体制才能做到，它的底层是小学，其教职员接受过中等教育，而中学教职员又是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担任，由研究院的毕业生负责管理。这样一个金字塔规定了可行的政治单位的最小规模。如果单位太大而不能容下这个金字塔，则不可能正常运行。单位不可能小于此。一些阻止单位过于庞大的限制因素在不同情况下也起着作用；但这是另一回事。……现代社会秩序的根基不是刽子手，而是教授。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和象征，不是断头台，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博士（*doctorat d'état*）。如今，对合法教育的垄断，比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更重要，更具核心意义。理解了这一点，民族主义的规则，以及其根源，即存在于某种现在普遍存在地社会秩序而不是人的本质中，也就可以理解了。”<sup>2</sup>在这种论述中，盖尔纳对工业社会上层文化建构的认识实际上与安德森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对民族意识的有意识重塑很相似，即强调顶层意识对非顶层社会的意识规制作用。民族作为国家社会中的次生单位，它无法自我生长，而必须通过外部的介入加以整体性的培育与规范。尽管在工业社会中对个人技艺的整体性要求大为下降了，但是对于社会技艺的要求则大为提高，并进而达到一种整体性的秩序，而民族主义就生长在这一秩序之中。

<sup>1</sup> 本书，第 37 页。

<sup>2</sup> 本书，第 45-46 页。



科层制在民族主义萌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韦伯曾认为“充分发展的科层制组织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就如同把机器生产与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一样。”<sup>1</sup>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层制的全面铺开是在工业社会，同样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一旦科层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它就成为社会结构中最难被摧毁的部分，可以说，科层制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使其成为管理民族国家的必要手段，同时民族国家的组织结构又反过来固化了这种科层制。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中，由于农业社会不足以支撑稳固的科层制，故而欧洲国家社会中试图保持自身文化同质性和政治结构稳固性的努力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没能真正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欧洲民族国家。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在世界整体范围内的统一科层制则是不可能的，文化宿命的分化使得全世界试图糅合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努力徒劳无功，从而不可能实现一个单独的政治权威以及统一的教育体系，进而就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民族与世界民族国家。

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曾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强加同质性，然而，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必然带来的同质性，最终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盖尔纳认为，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域或文化疆域，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sup>2</sup>在真实的历史中，民族主义的影响往往与工业主义带来的其他后果融合在一起。虽然民族主义的确是工业化社会组织的结果，但是，它不是强行实行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唯一后果。依照盖尔纳的看法，“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人们公认，民族主义利用了事先业已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或文化遗产，尽管这种利用是秘密的，并且往往把这些文化大加盖头换面。”<sup>3</sup>

按照盖尔纳的分析思路，“我们的模式的出现，得益于引入了三个真正有意义的因素：在我们希望意义上的权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sup>4</sup>权力的分化产生了统治层与被统治层，而在加入了教育这一维度之后则形成四种情况：“可能只有掌权者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权力特权来保持自己对受教育机会的垄断；或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都享有这种机会；亦或只有其他人（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享有这种机会，而掌权者却没有；有时候，双方都没有这种机会，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掌权者和行使权力的物件全都是一群毫无知识的人，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沉浸在乡村生活的极端愚蠢的活动中。这种局面非常可能存在，非常实在，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少见，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sup>1</sup>若再加上文化的维度，则产生了八种可能的情况：

1.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双方皆没有接受近代教育，故而都无法提出有效的号召以实践其民族主义。盖尔纳称其为“典型的前民族主义状态”（Typical pre-nationalist situation）。

2.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双方都没有接受近代教育，故而也都无法实践民族主义。盖尔纳称之为“非典型的前民族主义状态”（Untypical pre-nationalist situation）。

3.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掌权者接受了近代教育，而不掌权者没有接受这种教育，就形成了盖尔纳所谓的“没有族类区分的早期工业主义”（Early industrialism without ethnic catalyst）。

4.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掌权者接受了近代教育，而不掌权者没有接受这种教育，这就形成了“族类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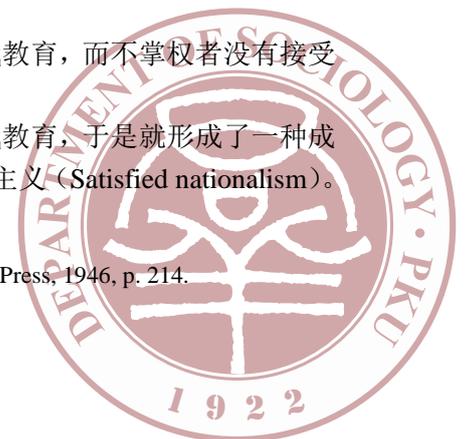
5.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双方都接受了近代教育，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同质化工业主义，进而产生了一种没有内部冲突的理想型的民族主义（Satisfied nationalism）。

<sup>1</sup> Gerth, H. H. 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14.

<sup>2</sup> 本书，第 53 页。

<sup>3</sup> 本书，第 74 页。

<sup>4</sup> 本书，第 128 页。



6.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双方都接受了近代教育，进而产生了要求阶级解放的西方民族主义（Classical liberal nationalism）。

7.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掌权者没有接受近代教育，而不掌权者则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形成一种犹太式散居化的民族主义（Diaspora nationalism）。

8. 掌权者与不掌权者处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掌权者没有接受近代教育，而不掌权者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产生一种十二月党人式的革命，而非民族主义者的革命。

盖尔纳在其中所作的相应概括强烈体现出他对民族主义的强烈功能主义视角。依据他的思路，民族主义是近代化的一个结果，民族主义对于近代化工程中的国家是有益处的，因为一个高度分化的劳动阶层需要一种统一的高层文化加以维系，而这种文化在一种高度发达的和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中更为稳固。在盖尔纳的分析路径中，民族主义被那些进行近代化的历史行动者们所有意识型塑，而民族主义与近代化之间的因果关联也并没有被那些在近代转型社会中的机制所深刻意识到，民族主义通过近代化国家的行动而得以推广。“民族主义并不是它表面上显现的那样，尤其不是它自认为的那样。民族主义声称保卫和复兴的文化，往往是它自己杜撰的东西，或者被它修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这种民族主义原则不同于它的每一种特殊形式，也不同于它鼓吹的各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共有的当前文化状况之中。”<sup>2</sup>

在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的离散性<sup>3</sup>成为一种常态，社会中的次生群体日益弱化，而民族作为一种抗拒离散性的社会组织方式，而“现代性的出现，总的说来取决于许多约束力强的小型地方组织的衰败，取决于它们被流动的、无个性特征的、识字的、给人以认同感的文化所取代。正是这种普遍化的状况，使民族主义规范化，并具有普遍性。”<sup>4</sup>

当然，在盖尔纳这种民族主义分析路径的盛名之下，批评之声亦多。塔比尼（Tambini）批评他的分析过于功能主义化；史密斯（Smith）认为他误读了民族主义与工业化的关系，而且并未能成功解释非工业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民族主义复兴问题；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认为用民族主义无法全然解释人们为国奋战牺牲的激情；柯文斯（Conversi）指出了盖尔纳分析路径忽视了战争与军事问题在型构民族主义问题中的巨大作用。但不管怎么说，正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在《卫报》1995年11月7日的纪念文章中所称的，盖尔纳“拒绝接受相对主义的立场，他将这种立场视作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一种背叛，一种懦弱的自我放纵”（he refused to accept relativist positions, which he regarded as a betrayal of an intellectual's duty, as a kind of unmanly self-indulgence）。从这种意义上说，盖尔纳对其理论的坚持是值得尊敬的。

“民族并不是印刻在事务的本质里的，它们并不是自然理论的政治版本。民族国家也不是什么族裔或者文化群体明显的最终命运。实实在在存在的是文化，它们往往微妙地组成群体，互相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相互交迭，相互缠绕；通常但并非始终存在着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的政治单位。”<sup>5</sup>每一种有效的民族主义，相对会有多种潜在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同时，更多的民族主义注定无法生根发芽。事实上，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同质性强加于人，而是反映了对同质性的客观需要。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民族主义本身而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民族主义注定会占主导地位。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某种古老的、潜在的和休眠的力量的觉醒，而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以深刻内化的、依赖于教育的并且受到各自的国家保护的高层次文化为基础。“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悬在任何一个胆敢违抗民族主义融合政治文化疆界的使命的政体头上，它终将消

<sup>1</sup> 本书，第 119 页。

<sup>2</sup> 本书，第 74 页。

<sup>3</sup> 这在中译本中译作“熵”。

<sup>4</sup> 本书，第 114 页。

<sup>5</sup> 本书，第 64 页。



失，不再构成一种始终存在的尖锐威胁。”<sup>1</sup>民族主义使用的文化针线和补丁绘制出了民族的图腾，同时又吹响了鼓舞人心的号角，如果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主义生发于大众内心的自我呼唤（一种内在的想象共同体过程）的话，那么盖尔纳所指称的民族主义则面对着那个远处的呼唤，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赋予他身份的那一部分不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与他人共有的普通技能，人们依赖的，是一种界定着‘民族’的共同的高层次文化。只有这时，这种民族/文化才能变成自然的社会单位，如果没有它自身的政治躯壳即国家，它通常是不能生存的”<sup>2</sup>，我们无法断然指出谁对谁错，唯有从这些满富激情的深度分析中寻找深深契合于自身的表达方式，而盖尔纳用其毕生精力作了具体而微的实践。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Ernest Gelln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3）

## 【书 讯】

##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 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马戎、郭志刚 主编

目录

序言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马戎
西部开发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少数民族教育	马戎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马戎
新疆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葛丰交 马军俊
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的成功——新疆大学双语教育体系的个案分析	祖力亚提·司马义
新疆哈萨克族双语教育现状分析——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调查	王晶晶
新疆南部中小学双语教学调查	李晓霞
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	李晓霞
新疆儿童失学情况调查	李晓霞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机会和双语教育政策、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苏金星
内蒙古民族中学的双语教育	常宝
草原上的学校——牧区蒙古族基层教育事业的变迁	马戎
内蒙古镶黄旗综合高中民族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李健
西藏牧区小学的发展——那曲地区达萨乡小学调查	朱志勇
高山上的小学——云南一所苗寨小学的调查	杨雪
四川凉山彝族双语教育	赵蕊
云南省白族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王晶晶

（本书已由民族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全书 70 万字，480 页，定价 72 元）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于长江

<sup>1</sup> 本书，第 155 页。

<sup>2</sup> 本书，第 187 页。

